

●要籍时评

流亡之魂与知识分子的良知

——读《失却家园的人》

许 钧

对中国大陆文学界的大多数同行来说,茨维坦·托多洛夫首先是个文学理论家,或者说,托多洛夫仅是个文论家。在他发表的著作中,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巴赫金:对话原则》(1981年)和《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1984年),这两部书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是北京大学的王东亮主译的,第一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中国读者见面,被收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后又于2003年出了第二版。据文库编委会称:“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见《现代西方学术文

库总序)看来,在主编者的眼里,《批评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托多洛夫的代表作。从文学批评探索角度看,托多洛夫确实是很做贡献的,《批评的批评》也的确标志着他的批评思想的确立,那就是基于对话之上的批评,名曰“对话批评”。王东亮认为,《批评的批评》,“叙述了托多洛夫本人的思想变化、成长过程,叙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保加利亚‘文学理论家’转变成形式主义者、结构主义者,又转变成对话批评的提倡者”(见《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译后记,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9页)。若认真阅读《批评的批评》,再浏览一下他的《幻想文学引论》(1970

年)、《象征与阐释》(1978年)、《诗歌语义学》(1979年)、《象征理论》(1987年),我们对作为文学理论家的托多洛夫可以有个基本的了解,对他在文学批评领域所走的路、他的思想变化、他的理论贡献,也不难有个大致的评价。

但是,若我们对托多洛夫的了解仅仅限于他的文学批评领域,或更有甚者,仅仅限于他的几部已有中译本的著作,或干脆只局限于他的《批评的批评》,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样的了解恐怕是不完全的,是片面而又缺乏深度的。我们知道,托多洛夫于1939年生于保加利亚,1963年定居法国,任法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员,自1965年出版他主编并翻译的《文学理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以来,已发表30多部重要著作。从时间上看,从1965年至1988年,他写的主要是有关文学批评的著作,除上文中我们已提及的之外,还有《结构主义是什么?》(1968

年)、《散文诗学》(1971年)、《结构主义是什么?》(诗学卷,1973年)、《普鲁斯特研究》(1980年)、《文学的概念及其他》(1987年)。而从1989年开始,似乎在托多洛夫的研究中出现了—个极为分明的转折点。他的注意力开始离开了文学,离开了形形式式的文学批评流派,离开了文学理论思考,而投向了社会、投向了历史、投向了人类生活的境况。1989年,他发表了《我们与他人》—书,该书以蒙田、狄德罗、卢梭、夏多布里盎、莱维—斯特劳斯等著名作家、思想家关于人类关系的思考为基础,对民族的多元性与人类的统一性问题进行了独特的探索。在这之后,他陆续又发表了《历史寓意》(1991年)、《面对极端》(1991年)、《征服美洲》(1991年)、《论滥用的记忆》(1995年)、《占领时期的战争与和平》(1996年)、《失却家园的人》(1997年)、《共同的生活》(1997年)、《未善园》(1998年)、

《恶的记忆与善的诱惑》(2000年)、《个体颂》(2001年)、《新的世界之乱——一个欧洲人的思考》(2003年)等著作。这份书目还远远不是完整的。我们在此之所以不厌其详,是因为通过这些书名,有心的读者不难看到,近几十年来,我们仅仅看作是文学理论家的托多洛夫已经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历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对人类社会与人类精神的深刻思考,他的强烈的批评精神,为他赢来了“人道主义使徒”的称誉。

在托多洛夫诸多的著作中,我们选择《失却家园的人》,把它推荐给广大的读者,应该说不是一种盲目的选择。理由有三:一是我们想通过《失却家园的人》,让读者朋友从相对熟悉的文论家托多洛夫身上看到他至今未为我们了解的一面。二是《失却家园的人》在托多洛夫众多的著作中虽然不能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但如果说《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给我们

展现的是托多洛夫所走的文学批评之路,那么《失却家园的人》则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展现的是他的人生之路,其内涵更深刻,其具有的启迪意义更为丰富。三是《失却家园的人》这部书集中地体现了托多洛夫所写的有关社会、有关人类境况思考的著作的文风和情致:看似平常的叙述中涵藏着深刻的思考,犀利的笔触中饱含着宽容,激烈而不留情面的批判却透着深切而真诚的人文关怀。

《失却家园的人》,于1997年由法国著名的瑟伊出版社出版,我是从一个法国朋友那儿听到这部书出版的消息的。那位朋友是法国《观点》杂志的文学部主任,她跟我谈起这部书时,似乎格外激动。在她看来,如今的作家大都关注面太小,思想也太浮浅,写的东西份量也就自然太轻。而托多洛夫则秉承了法国自蒙田以来体现在许多大作家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卢梭,如左拉,如法朗士,

有着对人类状况的深深忧虑和真切的关怀。她认为托多洛夫的《失却家园的人》是一部有着特殊价值的好书。当我问她这部书到底有何特殊价值时,她说让我自己先好好看看,她还说其中有些内容,恐怕“有些人”难以接受。说“有些人”这几个字时,她的眼中分明闪过一束“挑战”的目光。

怀着好奇,我打开了这部“有着特殊价值”和“有些人”也许难以接受的书。一开始,我就被深深地吸引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从梦中惊醒。”这个句子的结构,对法国文学的爱好者来说实在是太熟悉了。它出自普鲁斯特的辉煌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的开篇第一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这是一个颇具魔力的句式:短短的一个小句,拉开了普鲁斯特绵长的记忆之闸门,成就了一部追忆逝去的时光,再现生命之春的洋洋几百万言的不朽名篇。有趣的是,相同的句式,相同的第

一人称,而动作却完全相反:一个是“躺下”,一个是“惊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接着往下读,我们看到的不是期待中的“复杂、连绵、细腻的意识流动过程”,不是长达数行,甚至数十行不中断的“意识流连环句”,而是一个透着些许忧伤,含有几分恐惧的梦。

《失却家园的人》不像普鲁斯特那样从“躺下”开始,以复杂、绵长、多变的意识流,以声、色、味一应跃然纸上的描述,以妙趣横生的隐喻、双关,或近于戏谑的文学游戏,在近乎梦境的回忆中,为我们再现生命之春,而是以作者所走的一条真实的生命之路,以简洁有力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了他人生驿站中最具代表性的几段路程。而这一切是以惊梦作为开端,由恐惧而转为清醒:清醒的回忆,清醒的思考,清醒的判断。这是一条清醒的人生之路。全书因此而分成了三个大部分,分别为“一个保加利亚的原住民”、“一个法国公

民”和“一个在美国的访客”,外加作为开篇的“往返”与作为结尾的“在巴黎”。

开篇的惊梦,不是一个普通人的梦,而是一个有过特殊经历的人才有可能做的梦,这是一个流亡者的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从梦中惊醒。虽然细节各异,梦境大致是相同的。我不在巴黎,而在故乡索菲亚;由于某种原因我回到了那里,咀嚼着重见旧友、亲人以及重返家园的快乐。接着,离别、返回巴黎的时刻来了,情况开始变糟。我已登上有轨电车,它应当载我驶向火车站(多年前,就是这列东方快车,带我从索菲亚启程,两天后,在四月的一个凄冷早上,将我投放在里昂站),就在这时,我发现车票不在口袋,大概落在了家里,

可是,假如我回去拿票就会误车。或者,有轨电车遇到不知为何而闹事的人群,突然停下,乘客们纷纷下车,我也一样,我拎着一个沉重的手提箱,试图挤出一条路,但那是不可能的:人群牢不可破,那样淡漠,无法穿透。甚或,有轨电车到了车站,我已迟到,朝大门冲去;然而,刚刚跨过门槛,我发现这个车站只是个布景:另一边没有候车厅,没有乘客,没有铁轨,没有列车;不,我独自立在一个场景前,无边无际的是枯黄的草在风中折腰翻舞。或者,我乘坐由朋友驾驶的汽车从家里出发;由于时间紧迫,他决定抄近路;可是他走迷了,路越来越窄,越来越荒凉,直至消失在模糊不清的旷野中。

类似托多洛夫的这个梦,与他有过差不多相同经

历的捷克人米兰·昆德拉也做过。不过有的梦更恐怖罢了。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借主人公之一特蕾莎的名义,谈到了在一个封闭的游泳馆里二十来个赤身裸体的女人被一一枪杀的恶梦。在2003年问世的法文版《无知》中,他又以主人公伊莱娜的名义,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梦:

从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周起,伊莱娜就常做一些奇怪的梦:她人在飞机上,飞机改变航线,降落在一个陌生的机场;一些人身穿制服,全副武装,在舷梯上等着她;她额头上顿时渗出冷汗,认出那是一帮捷克的警察。另有一次,她正在法国的一座小城里闲逛,忽见一群奇怪的女人,她们每人手上端着一大杯啤酒向她奔来,用捷克语冲她说话,嬉笑中带着阴险的热忱。伊莱

娜惊恐不安,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布拉格,她一声惊叫,醒了过来。”(见《无知》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20页。)

若将托多洛夫的梦与伊莱娜的梦作一比较,确实如托多洛夫所说,虽然细节各异,但梦境大致相同:难以摆脱故乡和回归故乡的恐惧。据《无知》的叙述者说,从东欧流亡到西欧的人:“都会做这样的梦,所有人,没有例外;一开始,伊莱娜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黑夜中竟有这份兄弟情而感动。但后来又感到一丝不快:如此私密的梦中经历怎么能集体感受呢?那独一无二灵魂何在?然而思考这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何苦呢?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流亡者,在同一个夜晚,虽然梦境形形色色,但大同小异,做的是一个同一的梦。流亡者之梦:20世纪下半叶最奇怪的现象之

一。”(《无知》法文版,第21页)托多洛夫称这种梦是他个人的而又普遍的体验。以流亡者之梦这一20世纪下半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为开篇,托多洛夫想要给我们讲述的便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了。他想要以个人的经历为一条线,串起二十世纪下半叶他所经历的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融入其个人的思考。托多洛夫感觉自己似乎一直生活在梦中:“在索菲亚,法国的生活变成梦境,醒来才知道已无法回去。在新的梦里,我时常发现自己说:‘又是一个幽灵!’或者冷漠地说:‘我是个幽灵,确切一点儿:一个鬼魂。’”他感觉自己被分裂成两半,每一半都不真实。为了找回真实的自我,他回顾自己所走的路,哪怕有时不堪回首,哪怕回忆是痛苦而又残酷的。

第一部分《一个保加利亚原住民》就是一段痛苦的回忆。然而正是因了那痛苦而残酷的回忆,他才渐渐地有了深切的体悟和深刻

的思考。他的思考是个性化的,他没有从哲学上或从政治上,从经济上或从社会学上对在索菲亚的那段生活进行描述与思考,而是以其亲身经历为基础,将笔触深入到极权国家的国民意识深处,揭示他们对极权制度的印象。我们发现,在这一段人生历程中,他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极权”,而与之相关的有“集中营”,有“囚徒”。在托多洛夫看来,在保加利亚的那段人生经历,使他对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对极权主义的表现方式、对极权主义的存在根源、对极权主义的危害,都一一作了分析。应该看到,他的矛头所指是明确的,那就是东欧的政治社会制度。他的批判是强烈的,但却并不是情绪化的。字里行间蔓延的不是一种仇恨的情绪,而是一种近乎冷酷的反思。为此,他并没有因为东欧极权政治的垮台而盲目地欢呼自由,盲目地拥抱所谓的公正。相反,他看到“当共产

主义被抛弃之后,其他信仰纷纷再次粉墨登场,头上饰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光环。其中有民族主义及其必然结果——排外主义,有种族主义,还有宗教狂热情绪”等。对后极权时代,他感到深深的忧虑:“人们本以为极权制度下人的道德水准已跌入谷底,可是在后极权时代里它竟会继续堕落。”为此,他呼唤真诚,呼唤信任,希望出现一个“社会主义高效,人人活得有尊严”的社会。

有没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社会呢?托多洛夫在《失却家园的人》的第二部分中,给我们展示了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在这一部分,托多洛夫翻开了历史的老账,以克拉夫琴科及胡塞诉讼案和图维耶诉讼案为例,指出“跟在俄罗斯和保加利亚一样,在法国,集中营的支持者从未受到任何惩罚”。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往往起着滥用记忆,曲解历史的作用,左右着人们的选择,“种族仇

恨,对个人权利的践踏……痛苦死去的无辜就是这样选择的最终的结果。”为此,他以蒙田“我知道什么”的拷问,试图从两桩诉讼案的深层探究种族仇恨存在的根源,更以左拉式的“我控诉”,勇敢地呼吁知识分子的良知。为此,他对一个称职的知识分子作了界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科学家或艺术家(包括作家),他们不仅仅从事科学或艺术创作的活动,进而为真理的探索与美的进步做出贡献,而且关心公共利益,关心社会价值准则的演变,因此积极参与有关价值准则的讨论。”按照这一定义,在托多洛夫看来:“如果艺术家或科学不关心自己的作品或成果的政治及伦理意义,那么,他们跟不创造作品或成果的传教士或职业政治家一样,都不是知识分子。”看来,托多洛夫在这一点上与萨特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主张“介入”。就此,他在“知识分子政治”那一节中作了明确的表态,对知识分

子的立场、责任进行了探讨,也对知识分子的两难作了独特的分析。进而又对自由问题作了别具一格的剖析。“我们要求享有更多的、绝对的自由。”提出这样的要求合适吗?托多洛夫明确指出:“如果作家们要求享有在任何场合下发表任何言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对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感觉到公共利益的变迁与自己息息相关,应该渴望与公民对话,而不应满足于他们的崇拜:“这就意味着自由与权利需要责任与义务来加以平衡。”“极权”必然通往恶,而“自由”却并不必然通往善,一旦“自由”失控,必然又会走上自己的对立面:牺牲他人自由的极权。为此,他又呼吁民主,呼吁对话。在他看来:“政治与文学对真理有着共同的理解:真理不是独断的肯定,而是对话的结果。”不难看出,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一书中明确提出的对话批评在这部书

中得到了延伸,内涵变得更为深刻:提倡对话,这在今日不断加快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对消解民族间的冲突,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个在美国的访客》似乎又把我们的目光拉回到了文学。托多洛夫以一个访客的身份,对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术界的转型作了分析。为此,他以简洁的笔触,将此前的美国文学批评思潮作了一番回顾与评价:后结构主义、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批评以及批判人道主义,这些思潮都与某种价值标准有关。从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种种文学批判思潮在充当伦理裁决者的同时,很有可能成为政治的同谋,沦为极权的工具。

从文学批评思潮,托多洛夫转而又把注意力投向了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应如何定位?在围绕着人文科学地位的讨论中,美国的高校又发出了怎样的声音?

对托多洛夫来说,关注人文科学,是关注民主价值准则的一部分,也是人们思考民主的未来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这里,类似于“差异”、“个人价值”、“多元化”、“自由意志”这些关键词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了。从全书看,托多洛夫似乎并不忙于对这些关键词作出结论式的判断,而是以其个人的思考来影响,来激发更多的人与他共同思考,与他一道探索。

至此,从我们对全书的简要评述中,读者朋友也许已对这部书的“独特价值”和“有些人”难以接受的原因已经有所理解。在我们看来,其“独特”在于作者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心得。书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很说明问题:“失却家园的人,失却了生活环境、社会地位还有祖国,刚开始是痛苦不堪的:和亲人一起生活要愉快得多。然而他却可以从自己

的经历中得益。他学会不再将现实与理想、文化与天性混为一体[……]现在,我意识到,从索菲亚来到巴黎,我明白了相对和绝对这组概念。相对,是因为我知道了在我的祖国所发生的不应该在各处发生。绝对,是因为我在一个极权体制中成长,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我衡量丑恶的标准。‘什么都一样’的相对主义和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它们亦敌亦友,而我在道德评判过程中对它们均无好感,原因大概在此。”至于其难以接受,恐怕在于人们往往没有勇气面对赤裸的历史,面对赤裸的真理。对托多洛夫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认同。但对他直面历史的勇气,对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真理的执著探索,哪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会不表示钦佩呢?

2004年2月22日于金陵